

共情·涵导·内化:红色电影音乐 培育青年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彭尧

(湖南艺术教育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100)

摘要:红色电影音乐凭借音画融合的独特优势,深度参与青年价值观的涵育过程。本研究引入情动理论,构建“共情—涵导—内化”的分析框架,揭示红色电影音乐培育青年价值观的动态路径。“共情”环节借助音画对位与主题动机,将主流价值观融入沉浸式声景之中,在青年身体上引发情动落差与共振,促使其从历史旁观者转变为在场者;“涵导”环节在情动敞开状态下,借助仪式性音乐的显性符号与叙事内音乐的隐性渗透,将主流价值观顺势导入,形成显隐平衡的润化机制;“内化”环节经由观影中高峰体验所激发的情动刻痕与观影后的主体反思,使流动的情动凝结为稳定的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行为自觉。三个环节层层递进,深植于音画融合的情感直接性、记忆牢固性与接受隐蔽性三大传播优势之中。在此基础上,研究从情动触发、价值涵化、信念内化三个维度提出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路径;以沉浸式声景触发情动体验的创作与技术策略,以符号隐喻实现价值涵化的音乐编码策略,以体验转化促进信念内化的教育实践设计。

关键词:红色电影音乐;青年观众;情动理论;共情;涵导;内化

中图分类号:J617.6;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4-0070-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4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1]44},这对价值引领的载体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随着《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狙击手》《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的涌现,红色电影音乐经历了深刻的美学嬗变:在创作理念上,从辅助性的情绪烘托跃升为参与叙事建构的核心艺术力量;在音乐语汇上,打破单一、宏大的交响乐范式,将民族民间音乐、电子音效、流行编曲融为一体^[2];在视听关系上,以《长津湖》“冰雕连”场景中的《沂蒙山小调》与残酷战争画面的情感对位等为代表,创造了沉浸式的历史体验空间^[3],这一嬗变使红色电影音乐有效拉近了红色历史与当代青年的距离^[4]。本研究所言之“红色电影音乐”取其广义,涵盖影片中的主题音乐、背景音乐,以及主题曲、插曲等。

近年来,学界围绕红色电影与青年价值观培育展开了广泛研究。一是育人价值与功能的宏观论说。

收稿日期:2026-05-24

作者简介:彭尧,男,湖南艺术教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音乐教育、音乐表演。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五育并举’格局下红色音乐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5C1352)。

朱春燕、左依婷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文化、经济与国际价值等多重维度系统阐述了红色电影的思政功能^[5]；张萍萍指出，红色电影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育人目的、教育内容与展现方式上高度契合^[6]；王玉婷、王静洁则从导向、凝聚、激励三重维度概括新时代红色电影的思政育人功能^[7]。这些研究丰富了红色电影音乐的价值认知维度，但对其价值内化的心理过程仍缺乏深层解剖。二是融合路径与教育实践的方案设计。林莉、刘炆淳提出在课堂教学中“请进来”、在校园文化中“活起来”、在实践中“扎下根”的递进式培育方案^[8]；潘树涛主张将红色电影与专业课程相结合、举办主题实践活动并搭建新媒体教育平台^[9]。这些方案重在回答“怎么用”，但对接受端的心理机制关注不足。三是受众心理与审美接受的初步探讨。赵雨琪、孙锐尝试运用“心智模型”“集体无意识”等心理学理论，剖析红色电影对受众民族认同意识的影响机制^[10]；盛磊从叙事维度出发，指出新时代红色电影通过英雄塑造与观众情感共鸣、真实历史与价值阐释相交融等方式增强观众的审美接受^[11]；傅赟、周华分析了21世纪以来红色电影在叙事风格上的多元探索及其对青年观影体验的影响^[12]。这些研究开始转向接受主体，但尚未构建贯穿价值观涵育全过程的心理路径模型。

综上，现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仍有待深化：其一，理论视角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价值观涵育的心理发生机制仍是一个有待打开的“黑箱”；其二，研究多将青年预设为价值传播的接受客体，对其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身体性体验及非意识层面的接受过程关注不足。本研究采用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深入剖析红色电影价值内化过程中的身体性与非意识性。在理论层面，以情动理论为核心视角，构建“共情—涵导—内化”的分析框架；在经验层面，选取《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狙击手》《万里归途》《红海行动》等五部代表性新主流电影的音乐文本进行细读。同时，本研究在论证过程中选取豆瓣、B站等青年聚集的平台上相关影片的观众短评、弹幕反馈及二次创作案例作为分析文本，以辅助检验和丰富理论判断。

发轫于斯宾诺莎、经德勒兹与瓜塔里重新激活、由马苏米系统发展的情动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斯宾诺莎将“情动”界定为“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得以增加或减少的身体的感触”，动摇了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13]，这一界定为本研究将“身体感触”设定为价值涵育的逻辑起点提供了哲学依据——“共情”环节的核心，正是通过音乐激发青年身体的感触，在意识尚未介入时开启情动流通的初始通道。德勒兹与瓜塔里进一步将“情动”定义为“一个身体作用于另一个身体时所产生的力的强度”^[14]，这一定义中的“力的强度”概念，为本研究分析音乐如何作为一种“情动力”穿透观众身体、触发“共情”环节的情动共振，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马苏米继而作出了关键性推进：区分“情绪”与“情动”——“情绪”是在社会—语言层面上被固化的体验，而“情动”是前意识的“强度”，是身体行动能力发生的连续变化。马苏米通过“缺失的半秒”实验论证了情动反应先于意识判断^[15]。这一区分直接支撑了本研究对“共情”与“内化”两个环节的功能划分：“共情”作用于前意识的、流动的情动层面，“内化”则完成情动向被语言命名的、稳定的情绪与信念的转化。汪民安指出，情动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人是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16]。这一概括为本研究理解青年接受主体的根本特性提供了理论支撑——青年首先是情动流变中的身体，而非等待被填充的理性容器。上述脉络为本研究提供了三个洞见：情动先于认知，身体的感应是意识的前提；情动是流动的、可传递的力量；高峰体验产生的情动刻痕具有更强的记忆效应。

在这一视角下，红色电影音乐可以被视作一种直接作用于青年观众身体的情动触发器，通过声音的力量在理性判断前调节其感受强度，为价值接入准备情感土壤。鉴于此，本研究构建“共情—涵导—内化”分析框架，探讨红色电影音乐如何以音乐为媒介，进行情动流通、价值附着与主体重构的动态价值培育。

二、青年接受主体：情动身体的感性前提

在情动理论视角下，青年观众不再是一个等待被灌输价值观的被动客体，而是时刻与外界进行着能

量交换的情动身体。当代青年排斥抽象说教,渴求沉浸式体验,本能地寻求更强烈的情动刺激,这构成了红色电影音乐价值涵育的感性前提。

(一)感应的身体:情动流的发生场域

情动理论对身体的独特阐释为认识青年观众的情动身体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马苏米看来,身体是持续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始终保有一种“准备就绪”的潜能。青年观众(18~35岁)的感官敏锐度与神经可塑性处于高峰,身体对外界刺激的感应尤为强烈。当低音弦乐的持续强奏在影院中响起时,声音的物理振动经由听觉神经直接触发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反应,这些反应在时间上先于大脑皮层对声音的语义加工,这一现象印证了情动理论的核心主张:身体在意识察觉之前便已完成与世界的遭遇。传统教育方式之所以难以唤起青年对红色历史的共鸣,并非因为叙事缺乏感召力,而是因其呈现方式未能触达青年“感应的身体”。红色电影音乐以声音的力量直接作用于青年的情动身体,使青年身体在意识尚未察觉的瞬间便产生了唤醒反应,这缩短甚至消解了青年与红色历史主流价值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情感先行:情动流的速度优势与非意识涌动

当代青年的审美接受呈现出鲜明的“情感先行”特征,其深层机制有赖于情动的速度优势。神经美学研究表明,音乐引发情感反应的速度远快于语言概念加工。马苏米“缺失的半秒”实验表明,身体的情动反应比意识的情绪识别约早0.5秒发生,这意味着,当青年尚未在意识层面判断“这是一个感人的场景”时,其身体已被音乐所触发的声音力流的强度所穿透。这半秒的先机,正是“共情”绕过意识防御的关键窗口,“涵导”的顺势介入也依托于此。这种非意识的涌动,使红色电影音乐得以绕过青年“被教育”的心理防御——声音的力流从听觉神经直达身体,在意识反思之前已引发难以抗拒的情感波动,使身体沉浸其中而意识尚未启动防御。

(三)沉浸渴求:寻求情动强度的身体本能

当代青年对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的强烈偏好,可被理解为身体对更高情动强度的本能追求。持续的碎片化刺激不断减弱感受的强度,身体因此渴望遭遇打破惯常状态、引发强烈情动起伏的“事件”。红色电影音乐通过音画融合构建的沉浸式声景,恰恰提供了满足此类需求的高强度情动体验场域。班杜拉的“替代性体验”概念在情动框架中获得新的解释:替代性体验的发生不仅依赖于观察学习,更依赖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情动共振。当银幕上的人物在音乐高潮中完成壮举时,观众身体内部产生情动波动,这是对角色身体状态的内在模拟^[17],正是这种身体层面的模拟,使他人经验转化为“我”的体验,为价值认同奠定感性基础。

(四)情动理论与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会通

上述情动理论对“身体—情感—价值”关系的揭示,与中国传统“乐教”思想存在深层会通。《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18]163}其逻辑进路与“身体感触—情动流变”高度契合。儒家乐教传统历来主张“寓教于乐”“以文化人”,强调通过感性形式潜移默化地化育德行,这种“感于物而动—形于声—成于德”的育人路径,与“共情—涵导—内化”框架存在逻辑上的同构。红色电影音乐作为现代视听媒介中的“新乐教”形式,既承续了这一智慧,又以音画融合的技术手段将其推向更为直接的身体体验层面,使青年在身体被声音穿透的瞬间,已然具备价值内化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作为情动主体的青年观众具有三重特性:感应的身体、情感先行的涌动以及对高强度情动体验的本能渴求。这决定了面向青年的价值观涵育应遵循一条独特的路径:始于身体触动,经由情动流通,成于意义凝结。红色电影音乐的创作与传播,其首要任务便是在青年的“感应的身体”上开辟一个情动空间,使其在与历史的相遇中,首先成为一个“在场者”,这也构成了“共情—涵导—内化”框架逻

辑起点的理论基础。

三、价值培育的情动逻辑：共情、涵导与内化

在情动理论视角下,“共情—涵导—内化”三大环节的运行逻辑获得了全新的解释深度。本研究对三个核心环节作如下操作性界定:共情,即前认知层面身体情动的触发与共振,其核心可概括为“以声触身、情动共振”;涵导,即在情动敞开的状态下,运用显隐平衡的音乐符号策略将主流价值观顺势导入,其核心可概括为“顺势导入、符号润心”;内化,即在高峰体验的情动刻痕与主体反思作用下,流动的情动凝结为稳定的信念,并形成行为自觉,其核心可概括为“高峰刻痕、反思凝信”。三者并非从感性到理性的简单线性进阶,而是一个以音乐为媒介的情动力的持续流通、调节与凝结过程,三个环节层层递进,形成递进与反馈并存的动态循环。

(一) 共情:音乐情动的触发与身体在场

共情是涵育链条的起始环节,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音乐情动打破青年身体的防御状态,将其从历史的“局外人”转化为情感的“参与者”。根据情动发生的深度差异,共情可区分为情感触动、情感联结、情感代入三个递进层面。

1. 音画对位与同步中的情动触动

情感触动的深层机制在于音画关系的创造性处理在观众身体中制造出“情动落差”。音画对位是核心技法,指音乐的抒情走向刻意与画面的情感基调形成反差。《长津湖》“冰雕连”场景中,画面定格在极寒中战士被冻成“冰雕”的视觉形象,配乐却选取了《沂蒙山小调》婉转柔美的二胡与箫变奏。残酷画面与温情音乐之间形成巨大的情动反差,两种力量激烈对冲。豆瓣网友“江声”感叹道:“在沂蒙山小调响起的瞬间,(我的)眼泪根本控制不住”,这正是身体被音画协同的情动力量“击穿”的明证。

音画同步则借助音乐与画面形成的合力增大情动强度。《狙击手》中的“冷枪冷炮”段落以风声、雪声、呼吸声构成静默的张力场,使观众的身体处于紧绷的期待状态。在狙击手命中目标的瞬间,弦乐拨奏与画面同步爆发,“静默—爆发”的节奏反差精准地踩在观众身体情动曲线的临界点上,狙击手的英雄主义气质由此在身体被声音穿透的瞬间被直接“感知”。音画对位与音画同步两种手法共同在青年尚未启动理性判断时便完成了情绪的卷入与身体的敞开。

2. 主题动机贯穿中的情动联结

情感的触动是瞬时的,若不能转化为持续的情感联结,感动将随着观影的结束而消散,主题动机的贯穿与变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技法。《长津湖》志愿军主题动机的核心音程为纯四度上行跳进接续级进回落:出征段落以铜管强奏烘托昂扬明亮的情绪基调;战况胶着时,该动机转入低音弦乐声部,音色沉郁厚重;到胜利片段,旋律再度辉煌奏响,其中已然熔铸出饱含牺牲之痛的崇高意蕴。青年观众在被这一音响轨迹代入的过程中,身体内部经历了一场从激昂、紧张、沉痛到崇高、回响的微缩版情动历程,这种身体同步是建立深层情感联结的关键机制。《金刚川》从“士兵”“对手”“高炮班”三个视角反复讲述同一事件,各配以专属主题变奏,同时,共享旋律核心,结尾汇合为完整的《英雄赞歌》主题,使青年观众在对比与统一中体认英雄主义的丰富层次^[19]。当主题动机引导观众身体与角色身体进入同步的情动节奏时,他人的经验便经由身体中介转化为“我”的体验。

3. 沉浸式声景与情感代入

情感代入是共情的高级形式,其目标在于,使青年从对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发展为对整个历史情境的身体“在场”体验,而实现这一转化的艺术手段,就是构建沉浸式声音景观。“声音景观”概念由谢弗提出,指特定环境中所有声音元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听觉场域^[20]。声景的构建并非仅仅使青年“听”音

乐,而是使声音从四面八方包裹其身体,使其产生与被表现对象同处一个时空的真实感受。《长津湖》中的战场段落将配乐与风雪声、枪炮声、冲锋号、呐喊声无缝交织,形成动态、流转的完整声场。全景声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临场感——当声音在三维空间中精准定位时,子弹从左后方逼近、飞机从头顶掠过,观众的身体产生了真实的方位反应和闪避冲动。在声景的包裹中,青年观众以身体感受取代了保持安全距离的“观看”,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在场者的根本转变,为后续的价值涵导打通了情动通道。

(二)涵导:情动敞开状态下价值观的顺势流入

涵导是指在情动敞开状态下,借助仪式性音乐的显性符号与叙事内音乐的隐性渗透,将主流价值观顺势融入青年情动流的润化过程。共情解决“如何让青年愿意倾听”的问题,涵导解决“让青年听到什么、从什么方向理解”的问题。涵导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价值导向隐含于音乐符号的审美化表达之中,使价值导向成为情动的自然流向。这一逻辑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相契合:主流价值的整合更多地依赖于在文化领域赢得“自发”同意的机制^[21]。

1. 仪式性音乐:以价值锚定实现情动定向

显性引导承担着在影片关键节点标记价值坐标的功能,高度依赖音乐符号的编码与识别。仪式性音乐是实现显性引导的主要手段,以庄重、恢宏的音乐语汇营造仪式感,使价值内核在情动强度达到顶点时被铭刻于身体记忆之中,歌词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定向作用。在《我的祖国》主题曲中,“一条大河波浪宽”以具象意象唤醒观众的乡土记忆与感官经验,使“祖国”成为与具体生活场景紧密交织的情动对象;“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将个体情动升华为饱含深情的家国认同;“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以朴素的民间伦理与国家意志相呼应;当青年跟唱“这是强大的祖国”时,价值接纳便自然形成,这是情动层面的“被触动”而非认知层面的“被说服”。器乐同样承载着价值锚定功能:《长津湖》的片头交响乐以进行曲节奏建立起肃穆、崇敬的情动基调,片尾合唱将悲壮的情动升华为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22];《万里归途》中的撤侨高潮段落将《义勇军进行曲》核心动机发展为辉煌交响,“祖国接你回家”的价值理念与自豪感高峰体验被牢牢绑定。《义勇军进行曲》核心动机、唢呐标志性音色等符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已形成高度稳定的价值指涉,一经出现,青年观众便能在无意识中完成解码,这既保证了价值传递的明确性,又避免了直接说教的生硬感^[23]。

2. 叙事内音乐:从情感浸润到价值认同

显性引导确立了价值的明确指向,但若指向过于直白,则可能触发部分青年观众的意识审查机制。隐性引导的功能在于将价值理念隐入叙事肌理,使青年观众在对人物产生情动和认同的过程中,下意识地接纳其承载的价值内核。叙事内音乐是隐性引导的核心工具,指在影片虚构世界内的角色能够听到的音乐^[24],其声源在故事世界内,具有天然的生活化特征,观众通常不会将其识别为刻意的引导信息。例如,在《革命者》中,李大钊在狱中哼唱的段落,以朴素无华的声线呈现了一位革命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观影过程中,青年并非在“欣赏”一段音乐,而是“进入”了李大钊的情感世界——其身体接收到的是这位革命先驱临终时的情动振动,而非“爱国主义”的抽象符码。在对人物产生深层情感认同的过程中,革命理想、爱国情怀等价值观悄然流入青年观众的精神世界。又如,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回归》单元的国歌段落既是场景中的叙事音乐,又是每一个中国观众身体中早已铭刻的集体情动记忆载体。当这一旋律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被重新激活时,青年观众便被声音的力流“牵引”进了特定的价值坐标。

3. 显隐平衡:以隐性润化实现显性价值传递

涵导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显性引导与隐性引导在情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偏重显性引导可能触发意识警觉,偏重隐性引导则可能使价值指向模糊。符号化表达的最佳状态,是让符号既被观众清晰地感知和识别,又不被观众视为刻意的“教育”和灌输。《我和我的祖国》同名主题曲的创作策略为此提供了

经典参照:其旋律内核是已形成广泛情动记忆的经典旋律,成为显性价值锚点;在此基础上,采用流行化编曲重新演绎,使宏大叙事贴近青年日常的情动体验场域。这种“显性内核+隐性包装”的策略,在价值定向的清晰度与情动接受的亲和力之间达成了平衡,使观众的认同过程始终处于身体敞开与情感享受的状态。《红海行动》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显隐平衡的实践智慧:全片战斗段落大量使用环境音与电子音效营造紧张感,几乎不设置传统仪式性配乐,却在蛟龙突击队成功营救人质、撤出战区的结尾段落,让以铜管乐为主体的恢宏旋律首次完整奏出,使此前被压抑的家国情怀骤然释放。这种“蓄势—爆发”的结构,使显性引导成为情动流寻求释放的自然出口。这表明,显隐平衡并非简单的比例分配,而是对情动曲线节奏的精准把握——在青年身体渴望释放的时刻,价值符号的出现恰好满足了情动的需求。

(三) 内化:情动的凝结与主体的意义重构

内化是涵育链条的终端环节,其目标在于让流动的情动凝结为稳定的价值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觉的行为选择。凯尔曼态度转变模型中的“顺从—认同—内化”与本研究的“涵导—内化”在概念上高度呼应:涵导对应从“外部顺从”到“情感认同”的转化过程,内化则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价值的深度接纳。内化不仅是认知层面上的接纳,更是身体情动档案的更新与行动势能的重新分配。

1. 高峰体验中的情动刻痕

情感锚定是内化的基础环节,其机制在于借助观影中情动强度的巅峰时刻,将抽象的价值理念与高唤醒的身体体验深度绑定,形成难以磨灭的“情动刻痕”。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高情绪唤醒状态下,情感编码的信息记忆痕迹更为深刻、持久。情动理论对此给予身体层面的解释:高峰体验在身体中留下“情动档案”,当相似的刺激再次出现时,身体会先于意识回忆起当初的情动状态。在《长津湖》“冰雕连”场景中,悲壮、深沉的《沂蒙山小调》变奏配乐与屹立不倒的战士“冰雕”画面,共同将情动推向了悲痛、敬畏与震撼交融的体验高峰。在这样的状态下,“坚守”“牺牲”“保家卫国”等价值理念不再停留于抽象的语词层面,而是与那段刻骨铭心的旋律牢牢绑定,铭刻在身体的“情动档案”之中。《万里归途》的撤侨高潮段落则将《义勇军进行曲》核心动机推至辉煌交响,使青年观众体验到的自豪感、安全感与归属感达到全片高峰,“祖国接你回家”的价值理念与这一高峰体验被牢牢绑定,为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供了坚实的情感锚点^[25]。

2. 从情动刻痕到理性认同的凝铸

情感锚定奠定了情动动力和身体记忆基础,但观众在观影时的感动具有瞬时性,若不经沉淀与凝铸,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意义重构正是内化的凝铸环节,其功能在于引导青年观众将零散的情动印象整合为稳固的且可被言说的价值信念,其实质是将流动的情动体验转化为语言和叙事,成为“被命名的情感”。青年观影后撰写的影评分析、参与的网络讨论、制作的混剪视频或翻唱作品,均可视为意义重构的具体实践^[26]。以《长津湖》为例,大量青年观众在观影后撰写系统性分析文章,梳理配乐所传递的情感层次与价值内涵,阐释自身对牺牲精神、家国情怀等概念的深入理解^[27]。部分青年还通过剪辑影片素材与配乐创作混剪视频,对原初的情动体验进行二次编码与个性化表达^[28]。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后,不少青年翻唱同名主题曲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在对声音的再次演绎中重温并强化初次观影时的情动体验,将转瞬即逝的感动凝固为可反复回味的个人表达。在这些主动的创作与阐释活动中,青年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意义的积极生产者^[29],正是经由这种主动的意义重构,原本零散的观影感动被凝铸为清晰的信念,主流价值观从“他们的叙事”中被灌输的观念转变为“我的信念”。

3. 从信念到实践的情动转化

行为自觉是内化的完成形态,标志着价值观成为驱动身体行动的势能。当价值观经由情感锚定与意义重构的双重加工并沉淀为个体的内在信念之后,便获得了一种自主驱动的力量。不少青年在观影后主动搜索红色经典音乐进行赏析,自发地参与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或在日常交往中向他人传递自身的

价值认同^[30]。《红海行动》上映后,有的青年观众因受影片配乐与情节的感召持续关注中国海军发展,有的青年观众甚至表示“看完电影后决定报考军校”,青年观众的这些行为并非被动响应外在号召,而是源于个体内部被情动驱动的一种“想要”——“我想要更靠近那个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东西,我想成为那个曾经让我热泪盈眶的人”。维果茨基的内化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完整的解释框架:青年在观影这一社会文化活动中接触到的价值理念,经由情感锚定和意义重构的内在加工,最终转化为个体心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外化为自觉行为^[31]。情动理论则补充了身体维度的解释:行为自觉的本质是身体情动档案的深刻更新,当“保家卫国”等价值观从外部口号转化为身体内部的情动势能时,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自动触发便如同激昂旋律引发心跳加速一般自然,这不再是外在规约下的被动服从,而是情动驱动下的行为自觉。

四、音画融合的有机互构与三大环节的正向循环

三大环节的递进与反馈深植于音画融合这一独特的媒介形式之中。音画融合并非简单的声音与画面同步叠加,而是音乐织体与视觉构图在叙事进程中的有机互构,由此产生了单一媒介所不具备的独特情动优势,这些优势分别驱动三大环节的层层转换,进而形成正向循环。

(一)情感直接性驱动共情向涵导过渡

从共情向涵导的过渡是整个涵育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若后续引导破坏了此前建立的情感信任,身体便可能退回防御状态。音画融合赋予影片的情感直接性,正是衔接二者的关键桥梁。当音乐与画面协同运作时,声音的穿透力和视觉的冲击力在青年尚未启动理性判断的半秒内便已穿透身体、完成情动触发。涵导环节正是在这一意识被暂时悬置、情动通道完全敞开的临界时刻顺势介入——仪式性音乐的价值定向、叙事内音乐的价值隐喻不再遭遇理性审查式的抗拒,而是伴随着情动的愉悦自然流入青年的感知系统。情感直接性因此不仅是共情的触发器,更是衔接共情与涵导、保障涵育链条不被意识防御切断的核心机制。

(二)记忆牢固性驱动涵导向内化转化

涵导完成的是价值在情动中的定向,内化完成的是价值的扎根与沉淀。从“知道”到“成为信念”,中间需要记忆的巩固与反复激活。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听觉与视觉两个相对独立的通道协同运作能构建更为稳固的长时记忆表征^[32]。音画融合创造的多模态编码方式,使价值信息成为视听情动交织的复合记忆单元。仪式性音乐将价值指向融入庄重的听觉感受、宏大的视觉场面,叙事内音乐将价值隐喻融入表现人物命运的旋律质感与画面细节。“音—画—情—理”交织编码的情动记忆单元,比任何单一形式的语义记忆更具唤醒能量和抗遗忘能力,为内化环节的意义凝铸提供了更牢固的材料基础。

(三)接受隐蔽性驱动内化向新一轮共情回归

三个环节要形成自我维持的正向循环,关键在于内化完成后青年是否愿意再次主动投入同类作品的观看,接受隐蔽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循环驱动作用。由于价值涵导是隐藏在审美体验的表层之下的,青年观众回忆观影过程时,记住的是旋律的美感、人物命运的起伏和情动的震撼,其价值认同是伴随着这些审美记忆自然浮现的,而非被外力所强加。当这种认同以隐蔽而非显性的方式完成时,青年观众便不会产生被“教育”的抵触性反思,当其再次寻找同类作品时,其心态是审美的期待而非受教育的抵触。青年观众基于其已然内化的价值信念,与新的视听体验产生情感共振,形成比初次接触更深层的共情体验。由此,内化向新一轮共情回归,形成良性的情动循环。

综上所述,音画融合所赋予的情感直接性、记忆牢固性与接受隐蔽性,是共情、涵导、内化三个环节能够层层递进并形成正向循环的媒介情动根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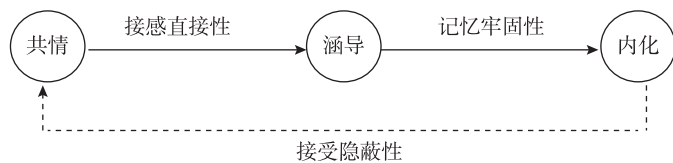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环节的递进循环示意图

这一动态循环在青年观影后的持续参与行为中尤为明显。不少青年在初次观影后,会带着已经内化的价值信念再次走进影院“二刷”“三刷”,或在B站反复观看配乐混剪视频。此时,他们的身体已不再是初次接触时的“白板”——旋律中一旦出现熟悉的情动符码,此前铭刻的价值记忆便随之被激活,新一轮共情在更高层次的认同基础上被强化。从体验到内化、从内化到再生产、从再生产到再体验,一个自我提升的情动循环由此生成,使红色电影音乐的价值涵育效应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延展。

五、实践路径优化:从情动触发到信念内化

上述“共情—涵导—内化”三大环节的理论阐释,为红色电影音乐培育青年价值观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指向,将这一情动逻辑转化为可操作的培育路径,需要从情动触发、价值涵化、信念内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 沉浸声景:触发情动体验的创作与技术路径

这一路径的核心目标是在青年“感应的身体”上制造更强烈、更持久的情动体验。在创作模式上,作曲家应在剧本阶段便深度介入,与导演、编剧共同设计贯穿全片的情动曲线——在何处蓄势、何处制造落差、何处释放与升华,使音乐与人物的心路历程、情节起伏形成有机联动。在具体技法层面,应精心设计音画对位与同步,增强艺术效果,在关键情节点将情动冲击最大化。

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手法的融合值得持续探索,如动画电影《火凤重天》将重庆方言童谣作为情动引线,这种“熟悉的陌生化”策略有效降低了青年观众对宏大叙事的心理防御阈值^[33]。新技术则为沉浸式情动氛围的营造打开了更大空间。全景声技术使声音在三维空间中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流动,虚拟现实技术可构建交互式红色历史场景,应在新一轮创作中加大对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力度。传播场景的拓展同样不可忽视,应将红色电影音乐的沉浸式情动体验延伸至红色主题展览馆、革命纪念地、高校校园等空间^[34]。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例,该馆围绕“红岩精神”与本土电影音乐资源,打造集“视、听、触、感”于一体的“红岩声景”交互式体验区:在空间分区上,设置“序厅—沉浸主厅—反思厅”三个递进区域,序厅播放不同年代红岩题材影片音乐片段,主厅利用多声道全景声系统将影片经典配乐与实地采样声景进行多层混音,反思厅以极低音量循环播放《红梅赞》器乐变奏,引导青年在情动余波中进行沉思;在技术集成上,引入可穿戴生理反馈设备捕捉青年聆听配乐时的生理情动指标,并以此驱动空间内差异化的声光联动,使个体的身体感应升华为具有集体感召力的情动共振体验;在情境设计上,根据红岩烈士真实事迹创编“声景微剧”,使青年在纯粹听觉引导的剧情中完成“微观的情动旅程”,这种高沉浸式的声景体验与影院观影形成了“银幕体验—实景强化—身体内化”的协同育人闭环。

(二) 符号隐现:实现价值涵化的音乐编码策略

符号隐现的核心在于,引导已被激活的情动流沿着正确的价值方向行进,但不触发青年观众的意识防御,因此,提炼更具辨识度的核心音乐符号是增强价值引导穿透力的基础性工作。特定的主题动机、标志性的乐器音色能够在青年身体中建立起条件反射式的情动——价值联想^[35],创作者应善于打造这样的“听觉标识”,使显性引导在符码层面即具备清晰的价值指向与情动唤醒能力。与此同时,应更加

娴熟地运用叙事内音乐、流行化编曲等隐性引导手段,消解价值传递的刻意感,降低情动接受的门槛。在歌词创作维度,应提炼具有高度意象辨识度的核心词句,使其如音乐动机一般贯穿影片的关键节点,使青年在传唱中自发完成价值的内化与再生产。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传播矩阵,是涵导优化在传播环节的着力方向,应鼓励青年围绕红色电影音乐进行二次创作,使其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价值涵导的主动参与者^[36]。重庆部分高校已将歌剧《江姐》的选段《红梅赞》作为隐性涵导符号融入沉浸式思政课堂,学生在角色扮演与情景朗诵中伴随旋律的反复变奏,自然而然地体认红岩精神的价值内核^[37],这一将红色音乐嵌入沉浸式情景教学的实践模式,实现了显隐路径的有机互补^[38]。此外,应建立创作前期的显隐平衡度审查机制,组建由创作者、教育者、青年受众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评估小组,在创作阶段对显性引导强度与隐性引导效度进行预评估,避免“用力过猛”或“指向不明”两种常见偏差。在新媒体传播层面,应充分利用抖音、小红书等青年聚集的社交平台,将红岩题材电影音乐的经典旋律片段、配乐创作幕后故事等内容进行短视频化的改编与传播,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红色音乐IP,使价值涵导从影院银幕延伸至青年的日常媒介接触空间,形成“观影触发—线上发酵—再体验强化”的传播闭环。

(三) 体验转化:促进信念内化的教育实践设计

体验转化的目标在于,引导青年完成从观影情动到理性认同、再到行为实践的完整闭环。设计丰富多彩的观影后意义重构活动,是教育实践环节的优先任务。高校应将红色电影音乐赏析与创作纳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体系^[39],开设相关选修课或工作坊,引导青年系统把握红色电影音乐的艺术特征与精神内涵,并对其情动过程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完成理性沉淀^[40]。同时,应定期举办主题影评大赛、红色音乐二次创作工作坊、红色文化跨代际对话等活动^[41]。重庆地区可依托“红岩连线”资源,组织青年与红岩革命烈士后代面对面交流,将银幕上的情动体验与真实的历史记忆相互印证^[42],使青年在感性触动之上叠加理性认知^[43]。湘潭理工学院依托韶山红色资源,先后与韶山市大坪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基地+课程+实践+研究”的系统化红色育人体系,其实践经验亦值得借鉴:通过组织学生为红色旧址创编情景配乐、开展沉浸式音乐党课等“创作—展演—反思”一体化活动,使青年学生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完成从情动到信念的转化。

构建校地协同的数字资源共享机制,是资源保障层面的重要基础。应整合电影制片厂、档案馆、博物馆、高校等各方资源,建设线上数字资源库,为青年提供便捷的赏析、学习与创作入口^[44]。同时,加强红色电影音乐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开发配套教学资源,使价值涵育从偶发性的观影活动步入常态化的课程体系^[45]。在激励机制层面,应设立专项基金或创作扶持计划,鼓励青年围绕红色电影音乐开展高质量的二次创作,对优秀成果给予表彰和传播推广支持,为价值内化提供基于真实场景的实践出口。

六、结语

本研究以情动理论为核心视角,构建并阐释了红色电影音乐培育青年价值观的“共情—涵导—内化”框架。研究表明,青年观众首先是情动的身体,这决定了对其的价值观涵育必须始于身体触动、经由情动流通、成于意义凝结。“共情—涵导—内化”是以音画融合为独特优势的情动流通、价值附着与主体重构的动态过程:共情通过情动落差触发身体共振,涵导在情动敞开状态下以显性和隐性双重路径将价值符号顺势导入,内化经由情动刻痕与意义重构将流动的情动凝结为稳定信念并驱动行为自觉。这一路径深植于音画融合的情动特性——情感直接性提供前认知渗透通道,记忆牢固性构建多模态情动编码,接受隐蔽性确保情动循环可持续。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了情动理论,揭示了“共情—涵导—内化”是以身体为场域、以音乐为媒介的情动的持续流通与凝结过程。面向青年的价值观培育,

其核心不在于“灌输”的精度,而在于“触发”和“形塑”情动的智慧。未来研究可结合神经美学实验与观众接受民族志等方法进行更深层的实证检验。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杨宣华, 闫芳惠. 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音乐的多元化传播[J]. 视听理论与实践, 2024(1): 60-66.
- [3] 董唯一, 李建林. 叙事、情感、氛围: 主旋律电影中音乐景观的三重空间[J]. 电影文学, 2025(1): 68-72.
- [4] 杜娟. 红色经典电影音乐作品的育人价值[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12): 143-145.
- [5] 朱春燕, 左依婷. 红色电影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功能及实现策略[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21-128.
- [6] 张萍萍. 红色电影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 传播与版权, 2025(20): 88-92.
- [7] 王玉婷, 王静洁. 新时代红色电影思政育人功能及其实现[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8): 74-76.
- [8] 林莉, 刘煊淳. 红色电影在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中的作用及实现路径[J]. 四川戏剧, 2021(11): 76-78.
- [9] 潘树涛. 论主流红色电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与策略[J]. 电影评介, 2022(9): 72-75.
- [10] 赵雨琪, 孙锐. 红色电影增强受众民族认同意识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558-564.
- [11] 盛磊. 新时代红色电影的叙事维度与文化价值[J]. 电影文学, 2026(2): 58-61.
- [12] 傅赞, 周华. 21世纪以来我国红色电影叙事艺术研究[J]. 电影评介, 2024(13): 83-90.
- [13] 张书端. 重返斯宾诺莎: 对电影研究“情动转向”的反思[J]. 当代电影, 2022(5): 45-50.
- [14] 郝强. 情感即生成——德勒兹情感理论的一种考察[J]. 外国美学, 2026(1): 196-210.
- [15] 刘芊玥. “情动”理论的谱系[J]. 文艺理论研究, 2018(6): 203-211.
- [16] 汪民安.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2.
- [17] 卢伦.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德育价值论述[J]. 社会与公益, 2026(2): 246-248.
- [18] 杜占明. 中国古训辞典[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 [19] 刘燕. 询唤·共情·新生: 新世纪主旋律电影音乐创作及转向[J]. 电影文学, 2025(16): 97-100.
- [20] 聂愿青. 默里·谢弗声景思想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24(3): 79-83, 136.
- [21] 万玉琛. 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政权意蕴及当代启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5): 36-49.
- [22] 梁文珊. 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电影音乐的时代价值及有效实践[J]. 枣庄学院学报, 2023(1): 106-111.
- [23] 李锦堂. 高校思政课程中爱国主义元素的设计与实施[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S2): 262-264.
- [24] 崔佑群, 安慧玉. 红色音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3): 77-80.
- [25] 刘洁. 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J]. 高教探索, 2025(S2): 99-101.
- [26] 田宇. 融媒体时代红色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传承[J]. 高教探索, 2025(S2): 114-116.
- [27] 王海兰. 课程思政理念下红色音乐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 高教探索, 2025(S2): 120-122.
- [28] 刘哲. 探索当代红色题材音乐剧的艺术特征[J]. 中国戏剧, 2024(8): 85-87.
- [29] 林美. 重审知识的价值与生成——维果茨基的“科学概念”思想及其教育学意义探析[J]. 教育学报, 2024(6): 34-47.
- [30] 蒋瑛. 红色音乐经典在高校音乐鉴赏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功能与应用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25(6): 36-42.
- [31] 郑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音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创新与实践研究[N]. 重庆科技报, 2026-02-24(005).
- [32] 李广霄. 新时代高校推进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略论[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3): 55-57.
- [33] 张敏敏, 刘宇. 主旋律专题片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逻辑进路[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6(1): 101-103, 121.
- [34] 匡君, 叶敏. 转变·互通·创新——音乐艺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3): 156-165.
- [35] 王思佳. 探索“思政+艺术”育人模式发挥红色电影音乐育人作用[N]. 中国电影报, 2024-10-30(12).
- [36] 王泽楠. 高校思政教育的新挑战——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J]. 传媒, 2025(18): 100.

- [37] 周晓敏. 高校思政教育立德树人价值的实现路径——评《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探析》[J]. 中国教育学刊, 2026(3):122.
- [38] 姚春花. 高校思政课程育人的实效性提升——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6(3):117.
- [39] 付玲, 魏进平. 教育强国建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论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4):25-27, 47.
- [40] 吴金花.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模式构建——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6(2):121.
- [41] 陈微, 高星.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9):125.
- [42] 周岑岑. 数字赋能高校音乐课程思政创新路径探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10):171-180, 188.
- [43] 陈洁云. 高校思政课提升大学生获得感的策略探究[J]. 高教探索, 2025(S2):72-74.
- [44] 李转. “互联网+红色文化”强化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研究——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10):2.
- [45] 肖敬寒, 柴素芳. 红色电影赋能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逻辑、价值与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1):128-135.

Empathy, Cultivating Guidance, Intern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Pathways of Cultivating Youth Values through Red Film Music

Peng Yao

(Hunan Institute of Arts Education, Changsha 410100, China)

Abstract: Red film music,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 of audio-visual integration, deeply participat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youth valu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affect theory and constructs the core framework of “empathy - cultivating guidance - internalization” to reveal the dynam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red film music cultivates youth values. Accordingly, value cultivation begins with bodily affection, proceeds through affective circulation, and culminates in meaning condensation. The “empathy” phase, through techniques such as audio-visual counterpoint, thematic motif development, and immersive soundscapes, creates affective disparity and resonance within young bodies, transforming them from historical bystanders into present participants. The “cultivating guidance” phase, in the state of affective openness, leverages the explicit symbols of ceremonial music and the implicit infiltration of diegetic music to smoothly introduce mainstream values, forming a balancing mechanism of explicit-implicit cultivation. The “internalization” phase, through affective imprints of peak experiences and post-viewing reflective engagement, condenses fluid affect into stable beliefs, which ultimately externalize as behavioral self-discipline. The three phases progress in a layered manner, deeply rooted in the three major media advantages conferred by audio-visual integration: emotional immediacy, memory robustness, and reception concealment.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is study articulates a tripartite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youth values through affective triggering, value enculturation, and belief internalization. The proposed pathways comprise: immersive soundscape design and technical interventions to evoke affective responses; symbolic-metaphoric coding in music to facilitate value enculturation; and experience-driven pedagogical practices to enab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lief internalization.

Keywords: red film music; youth audience; affect theory; empathy; cultivating guidance; internalization

[责任编辑:赖黎捷]